

维摩变在北魏洛阳石窟中的文化意义

贺玉萍

(洛阳理工学院 中文系, 河南 洛阳 471023)

摘要:北魏洛阳石窟维摩变寄寓了北方士人的文化理想,体现了士人放旷不羁、向往自由的精神,它与庄重神秘的宗教题材有相当大的反差,说明佛教在汉文化核心区域发展过程中,在题材和精神上都受到河洛文化的影响和改造。

关键词:北魏洛阳;石窟;维摩变;文化意义

中图分类号:J3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365(2010)01-0110-04

维摩变是北魏洛阳地区诸石窟中一常见题材。在石窟造像中,维摩诘是唯一以世俗人形象出现的宗教人物,体现了复杂的历史文化背景,具有极为特殊的文化意义。目前,对这一题材的研究多局限于石窟考古和石窟艺术方面,对其文化内涵的渗入阐释比较缺乏,尤其是北魏洛阳地区的维摩变综合文化研究尚属空白,本人结合石窟调查中的新发现,试作一番探讨。

一

维摩诘是释迦牟尼同时代的一位大乘居士,是远近闻名的在家菩萨,拥有广大田庄和财产,精通佛法,能言善辩,知识渊博,道行深厚,非常善于随机化导。维摩变是依据《维摩诘所说经文殊菩萨问疾品》造像的,该经通常又称为《文殊菩萨问疾品》、《维摩诘经》。《文殊菩萨问疾品》较长,其中一段载:“于是文殊师利与诸菩萨大弟子众及诸天恭敬围绕,入毗耶离大城。尔时长者维摩诘心念,今文殊师利与大众来,即以神力空其室内,除去所有及诸侍者,唯置一床以疾而卧。文殊师利既入其舍,见其室空无诸所有,独寝一床。”^①维摩变造像就是截取了这段经文所描述的维摩居士和文殊师利菩萨对坐辩论的场面,构图成画。北魏洛阳石窟维摩变比较著名的有吉利万佛沟上寺三号窟、巩义石窟二号窟、龙门石窟宾阳中洞、龙门石窟莲花洞等处。我们以宾阳中洞东壁浮雕为例:

主尊北侧上层的文殊师利头戴花冠,缙带飞扬,身上披巾敷搭双肩,颈下饰项圈,面容端庄,身

边的诸弟子恭敬肃立。主尊南侧上层画面上,维摩诘头戴小冠,褒衣博带,手持麈尾,右腿蜷局而立,箕踞斜卧于帷帐之中的胡床上,面容清癯,颌下长髯,沉静的面容中透露睿智散淡的神情,俨然名士之风范,与文殊师利形成鲜明的对比。维摩诘这种形象在整个洞窟人物造像中是绝无仅有的,与神圣的神祇形象和恭敬的世俗形象大相径庭,给凝重的氛围带来全新的气息,其背后体现着一种地域的、传统的、士人的精神。

盖洛阳为魏晋风流之渊薮,彼时士人行为放旷,重神理而遗形骸,往往不拘礼法,喜欢标新立异,以肢体语言与服饰的不同来显示与众不同。“箕踞”姿态,宽肇、帷帐、麈尾等都被那时士人赋予了特定的含义,成为具有特殊身份象征的什物,这些皆可在《世说新语》看到形象的描述。

1. “箕踞”。“阮步兵丧母,裴令公往吊之。阮方醉,散发坐床,箕踞不哭。”^②“晋文王功德盛大,坐席严敬,拟于王者,唯阮籍在坐,箕踞啸歌,酣放自若。”^③“阮步兵啸闻数百步。苏门山中,忽有真人,樵伐者咸共传说。阮籍往观,见其人拥膝岩侧,籍登岭就之,箕踞相对。”^④可以看出,“箕踞”不仅有从容、不以为礼的意味,更包含着自信、自傲的含义。

2. 床帐。即帷帐与胡床。“朱永长,理物之至德,清选之高望;严仲弼,九皋之鸣鹤,空谷之白驹;顾彦先,八音之琴瑟,五色之龙章;张威伯,岁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陆士衡、士龙,鸿鹄之裴回,悬鼓之待槌。凡此诸君:以洪笔为锄耒,以纸札为良田,

收稿日期:2009-10-25

基金项目:2009年河南省科技厅软科学资助项目(批准编号为092400440046)。

作者简介:贺玉萍(1964-),女,山东莱阳人,洛阳理工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古代文学。

以玄默为稼穡,以义理为丰年,以谈论为英华,以忠恕为珍宝,著文章为锦绣,蕴五经为缙帛,坐谦虚为席荐,张义让为帷幕,行仁义为室宇,修道德为广宅。”^⑥床帐起源甚早,至汉代已广为流行,成为贵族、仕宦阶层钟爱的什物。洛阳曾出土许多汉代铁质帷帐杆础。到了魏晋之际,床帐的应用就更为普遍,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礼异》关于北魏时期帷帐有这样一段记载:“北朝婚礼,青布幔为屋,在门内外,谓之青庐,于此交拜。”^⑦床帐更是士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物品,帐中横卧,是他们一种行为的时髦,床帐在士人吟咏中更是常见之物,阮籍就有“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之名句。酈道元在《水经注》中说,他上八公山,看见“庙中图安及八士象,皆坐床帐,如平生。”^⑧安,即淮南王刘安。可见当时床帐已成为身份的一种象征。

3. 宽褰。是褒衣博带的一种,褒衣博带乃儒士装束。魏晋名士喜穿宽大的服装,尤其喜欢大褰。“王逸少作会稽,初至,支道林在焉。……王遂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⑨宽衣大褰、褒衣博带早已成为士人形象的特征,为魏晋和南北朝所青睐,南朝绘画艺术即以“褒衣博带”来描摹士人形态。

4. 麈尾。“王长史病笃,寝卧灯下,转麈尾视之,叹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及亡,刘尹临殡,以犀柄麈尾著柩中,因恸绝。”^⑩再如:“孙安国往殿中军许共论,往反精苦,客主无间,左右进食,冷而复暖者数四。彼我奋掷麈尾,悉脱落满餐饭中,宾主遂至莫忘食。”^⑪麈尾是一种大鹿的尾巴,宋人吴曾《能改斋漫录》转引释藏《音义指归》:“名苑曰:鹿之大者曰麈。群鹿随之,皆看麈所往,随麈尾所转为准。今讲僧执麈尾拂子,盖象彼有所指麾故耳。”^⑫由此可知,麈尾乃僧家之物,后为士人喜爱,逐渐成为魏晋名士的一种象征。

《文殊菩萨问疾品》对维摩诘形象描述仅仅是一句“置一床以疾而卧”而已,并没有过多的渲染,而维摩变全把他塑造为“箕踞而坐”的形态。“箕踞而坐”,散诞而不庄重,并把宽褰、帷帐、麈扇等象征名士特有身份的器物集于其身,寓意十分明显。我们对照一下甘肃永靖炳灵寺石窟一百六十九窟北壁的一幅西秦建弘元年的维摩像,该像是现存最早的维摩造像,维摩诘手中既未持物,头顶也无帷帐,与北魏洛阳石窟维摩之像迥然不同。这更能从另一方面说明洛阳地区维摩诘有着特有的地域

与时代的文化含义。

值得指出的是,维摩变造像出现的宾阳中洞、莲花洞、巩县石窟二号窟均为贵族所造,万佛沟石窟上寺二号窟则为高僧所建。这说明维摩诘这一形象的建造多为上层贵族、有道高僧和士人阶层所为,而这一群体都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另外,在北魏洛阳石窟中,维摩诘的位置安排也比较随意,甚至在万佛沟二号窟中,维摩和文殊的位置都被颠倒了,这说明造像者的关注点在于通过维摩诘表达一种情绪而非宗教理念。

二

北魏洛阳地区维摩诘造像具有以上特点,与时代和地域有很大关系。缘洛阳是魏晋之风的发源地,彼时,唯心主义形而上的玄学占据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在玄学思潮影响下,哲学不断挣脱儒教经学的束缚,转而与佛教交融,并逐渐在士人精神上形成新的倾向,即从重实证向重义理、从重个体到重自然、从重现实到重虚妄的转变。尤其在正始年间,谈玄成了风潮,成为特有文化素养的象征,思辩妙解成为高远之士宇宙人生观的外象与行为阐释的最好注脚。这种风气影响甚广,晋室东渡之后,谈玄之风在南朝更加炽张。《陈书·袁宪传》记载了袁宪在十四岁即参与谈玄。清谈之盛,可见一斑。这些不能不影响到北魏朝。另一方面,彼时佛教的异常发达,使得中原哲学核心结构发生了巨大改变,这种变化传导至文学艺术领域,极大撼动士人的审美理想和文化行为。审美理想和文化行为的明显变化,反过来影响哲学与佛教思想,于是出现了共鸣互动。东晋时期的译经活动已不单纯拘泥于原著的翻译,在翻译过程中,力求在阐释解籍原旨思想的基础上,尽可能的迎合时代思想,汲取当地文学素养,以最大限度的扩大译著的影响,已成为当时佛经翻译的主流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佛经翻译称为译著更为恰当。这一点已为学术界所承认。《文殊菩萨问疾品》就很好的融合两种主流思想,并表现出空灵透脱、言玄旨远的文学特征的一部翻译著作。

1. 在思想上它丰富和改造了文学的内涵及文学理想。我们知道,玄学即研究幽深玄妙问题的学问,以辩证“有无”为核心。王弼《老子注》说:“朴之为物,愤然不偏,近于无有,故曰莫能臣也。抱朴无为,不以物累其真,不以欲害其神,则物自宾而道自得也。”^⑬把“无”当作“有”的根本方法,通过形而上

的思辨方式,构建一系列玄虚的哲学概念,在尽意过程中,不断摒弃“有”的存在,以达到“得意忘言”,“寄言出意”的效果。维摩变所截取《文殊菩萨问疾品》所描写的场景,极有典型意义。“文殊师利即入其室,见其室空,无诸所有,独寝一床。”这里“室空”,显示了佛教所说的诸法性空之理,象征“于我无我而不二,是无我义,”^⑬“无诸所有”,则是玄学所谓“有”本于“无”。这里把佛教的“空相”理念与玄学的“有无”理念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哲学效果,是时代哲学理念在译著中的典型体现。《文殊菩萨问疾品》在演绎哲学概念时,尽可能淡化佛教色彩,采用“独寝置一床”喻示“空”,以一切众生病,是故我病,若一切众生得不病者,则我病灭,这是喻示“相”。句句玄远,无所依凭。

2.《文殊菩萨问疾品》在语言艺术方面也把佛经所擅长的问答形式与士人清谈形式完美结合起来,使语言更加洗练、精美。如:“时维摩诘言:‘善来,文殊师利!不来相而来,不见相而见。’文殊师利言:‘如是!居士!若来已,更不来;若去已,更不去。所以者何?来者无所从来,去者无所至,所可见者,更不可见。且置是事,居士!是疾宁可忍不?疗治有损,不至增乎!世尊殷勤,致问无量,居士是疾,何所因起?其生久如?当云何灭?’”^⑭这一段语言以玄相妙语推演机辩解答,旨趣幽深,具有空谷传音之妙。我们以后世的《世说新语·简傲第二十四》比较:“钟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识嵇康,钟要于时贤俊者之士,俱往寻康。康方大树下锻,向子期为佐鼓排。康扬槌不辍,傍若无人,移时不交以言。锤起去,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⑮二者在语言风格上,形象描绘和义理旨趣上,如出一辙。尤其是“来者无所从来,去者无所至”和“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一语,几可混真,谈锋机辨而闪耀着智慧的光芒,为士人所激赏。

3.《文殊菩萨问疾品》塑造了具有典型意义的维摩诘形象。“尔时长者维摩诘心念,今文殊师利与大众俱来,即以神力空其室,除去所有及诸侍者,唯置一床以疾而卧。”^⑯这种描写简约传神,给人顿脱束缚、不拘小节、隐然忘形的提示,为其他艺术形式的创造开辟广阔的想象空间。

所以,依照《文殊菩萨问疾品》而创造出来的维摩诘形象,迎合了当时士人对佛学、玄学的理解,迎合了他们的审美趣味,较好表现了译著佛经的思想精髓,符合汉地知识分子的心理,所以得到士

人阶层的普遍喜爱。这本身就是汉地文化对佛教的兼容与改造,是当地士人阶层共同意识对维摩诘形象的改造与重塑。

三

现在最为流行的《文殊菩萨问疾品》是东晋鸠摩罗什所译著的。鸠摩罗什是一位深谙佛理的高僧,《魏书·释老志》载:“鸠摩罗什为姚兴所敬,于长安草堂寺集义学八百人,重译经本。罗什聪辩有渊思,达东西方言。”^⑰“与罗什共相提挈,发明幽致。诸深大经论十有余部,更定章句,辞义通明,至今沙门共所祖习。道彤等皆识学洽通,僧肇尤为其最。罗什之撰译,僧肇常执笔,定诸辞义,注《维摩经》,又著数论,皆有妙旨,学者宗之。”^⑱由于鸠摩罗什“达东西方言”,他对前人翻译的经书不符合汉文章句辞意的问题十分不满,所以重译经本。当时参与重译工作的不仅是鸠摩罗什一人,其他有名的僧人也参与进来。他们是按照更定章句、辞义通明的原则“定诸词义”,对佛经重新进行了阐释、注疏。《维摩经》就是他和众人多次商讨,更定而成的。鸠摩罗什等人精通汉地中原文化,他的译著充分考虑中原士人欣赏习惯,自觉主动接受了汉文化影响,对佛经的重译实际是一种创新的著作,这一点在不同版本的《文殊菩萨问疾品》中可以明显看到。南怀瑾先生《花语满天花说法》中称赞道:“我一再讲,《维摩诘经》翻译得太好了,文字容易懂,但是每次愈读愈害怕,因为每一字每一句里,包涵的意义太多了,但是大家都被文字盖过去了。”^⑲龚贤《佛典与南朝文学》第四章说:“《维摩诘经》在东晋齐梁时期的广泛传布,对士人心态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⑳《文殊菩萨问疾品》所表现的精神风貌对后世文学尤其是《世说新语》产生深刻影响。再者,南北朝对峙,南朝文化较之北方更为领先发达、对北方的影响是显而易见。最早创作出维摩诘形象的是东晋顾恺之,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说:“顾生首创维摩诘像,有清羸示病之容,隐几忘言之状。”^㉑虽然我们现在不能判断顾恺之的维摩诘画像是否具有石窟维摩诘造像的具体特征,但是可以想象,他笔下人物当应兼具当时名士的神韵,因而才会名噪一时。维摩诘造像之写法源自南朝艺术更是毋庸置疑。第三,北魏地域文化风貌和士人精神与南朝迥然不同,庄重质实,简约坚贞。我们在史传中很难发现北魏朝士人名士风范,反而对他们的精神面貌的感觉相当模糊。特别在北魏文学作品中,更难找到飘逸洒脱、清

谈品题的影子,似乎魏晋风流已从河洛大地飘然而去。而只有当我们面对石窟中维摩变时,才蓦然感受到北魏士人精神中同样顽强的、执着的存留着士人风流那一动人的遗韵,才能窥视到《文殊菩萨问疾品》所具有的极强的穿透力和影响力。毕竟曾为清谈之风源头的河洛之地,其精神深处依然怀有对往昔文化辉煌的强烈的眷恋与回归之情。

所以说,洛阳地区北魏石窟维摩变是士人的精神在时代变迁下于石窟造像中的表现,是向往洒脱自由、遁脱束缚情感在宗教领地的无奈栖身,是自信含蓄与独立理想的存留。

注释:

①《乾隆大藏经》第33册《维摩诘所说经》第694页,中国书店出版社,2007年8月出版。

②③④⑤⑧⑨⑩⑪毛德福主编:《文白对照全译世说新语》,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14页、331页、276页、169页、81页、272页、79页、332页。

⑥段成式:《酉阳杂俎》,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页。

⑦酈道元注,杨守敬疏:《水经注疏》卷三十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版。

⑧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611页。

⑨《诸子集成》第三册王弼《老子注》,上海书店1954年版,第18-19页。

⑩⑪⑫《乾隆大藏经》第33册《维摩诘所说经》,中国书店出版社2007年8月出版,第684页、694页、694页。

⑬⑭魏 收:《魏书》,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031页。

⑮南怀瑾:《花语满天维摩说法》,台湾老古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

⑯龚 贤:《佛典与南朝文学》,江西出版集团、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70页。

⑰[唐]张彦远著:《历代名画记》,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年版,第41页。

[责任编辑 余三定;责任校对 鲁 涛]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THE VIMALAKIRTI ON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GROTTOES IN LUOYANG

HE Yu-pi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Luoya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Luoyang 471023, China)

Abstract: Korimaro Story on the Northern Wei Luoyang Grottoes ignites the cultural ideal of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scholar, presents the spirit of freedom. It is different from the religious subjects. In the process of Buddhist Sinicism, It was affected and transformed by the Heluo Culture.

Key words: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in Luoyang; grottoes; the Vimalakirti Sutra story; cultural significance

《明代科举与明中期至清初通俗小说研究》简介

《明代科举与明中期至清初通俗小说研究》(叶楚炎著)于2009年6月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通过对大量散见于众多作品中的相关描写的钩稽,以翔实的资料,令人信服地指出明中期至清初通俗小说已经广泛、深入地涉及了科举制度的各个方面。这种揭示不但丰富了我们对于当时通俗小说内涵的认识,并有可能成为进一步反思小说家身份、经历与创作间关系以及小说题材、传播等诸多问题的一个新维度。(鲁 涛)